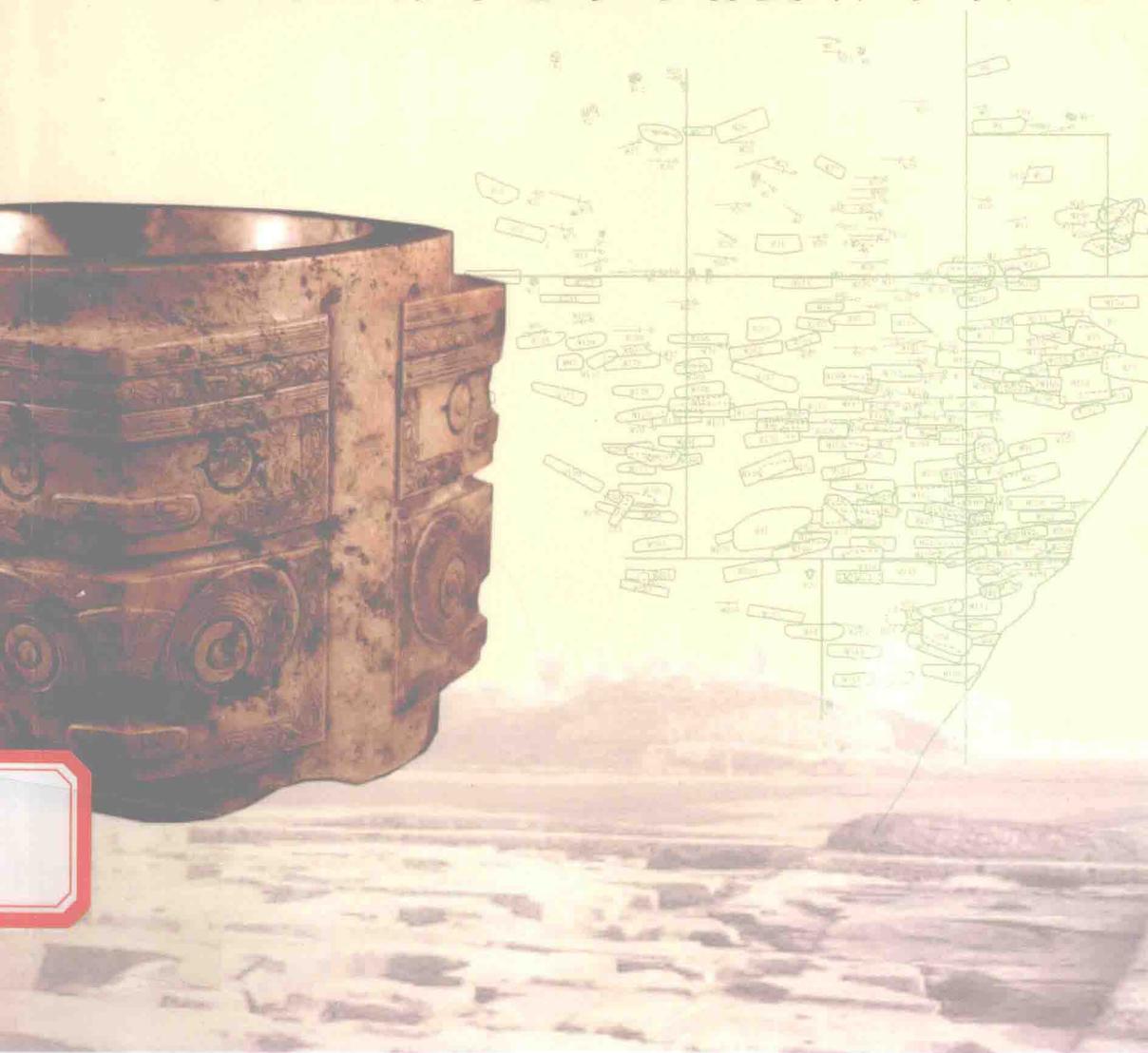


丁新著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

丁新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 / 丁新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7

ISBN 978 - 7 - 305 - 17327 - 1

I. ①中… II. ①丁…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126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
著 者 丁 新
责任编辑 官欣欣 李鸿敏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6 字数 262 千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7327 - 1
定 价 5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账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献给养育我们成长的
姚氏、陈氏和丁氏
三先人

代 序

非常惭愧写下“代序”这两个字，因为作为本人学术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和博士学位论文，和所有作者一样，我们都期望获得前辈的指点，恩师赐序。然而，作为一本仓促付梓的不成熟的研究成果，笔者姑且写下这寥寥数语，以交待这本书的前世今生。

笔者 2002 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拜在计秋枫教授门下，攻读国际关系史硕士学位。2007 年，在硕士毕业两年以后重新回到先生门下，继续攻读国际关系史专业博士学位。从硕士阶段，笔者即从事美国军事战略改革相关的研究，博士阶段继续此项研究。然而，作为一所地方非军事院校，缺乏一定的军事研究资源和环境，所以这一研究始终步履维艰。而在南京大学底蕴深厚、种类齐全的历史学研究大环境影响下，加之深受导师计秋枫教授开阔研究视野的熏陶，笔者逐渐对中国古代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做了初步的学习和研究。2012 年，在博士阶段学习四年之后，笔者自作主张将研究方向转入了有关中国民族认同起源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又步入了考古学的领域，并且得到了今天笔者博士后导师水涛教授的帮助和指导。

尽管笔者自行选择了论文的选题，计秋枫教授依旧在论文的写作和答辩过程中给予了最充分的指导和支持，尽管作者其时并非考古学专业的学生，水涛教授依然给予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且全程参与了本文的预答辩、论文评阅和正式答辩，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本文选题源于对汉民族身份认同源头的追问，由秦汉民族认同溯源到诸夏认同，进而加入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讨中去。中国文明起源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界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从国家、机构、学者对此领域研究投入的规模和重视的程度而言，它是中华民族寻根问祖、重塑集体记忆的一项宏伟工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门外汉、一个没有学术根基的年轻人是没有资格随便踏入这片圣地的。然而，笔者自攻读博士研究生起八年间，无论思考国际关系、中国外交方面的问题，还是关注国计民生等社会热点问题，在刨根问底之后，

几乎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指向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认同问题，它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决定着它今天的面貌，它的现状和未来又牵动着这个民族每一个个体对自身命运和价值的思考。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伦理道德的构建，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国家软实力的建设，无一不与民族认同这个根本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决心把“诸夏”这个迄今为止人们知道的最早的本民族认同概念搞清楚之后，笔者就义无反顾地走进了考古学的研究领域。

最初，只是想把对诸夏认同的探索作为一个背景知识交待一下。但是，当带着一颗国际关系学的初心，行走在考古学的领地时，我感觉自己在大量汲取考古学和古代史的基础知识时，在勉强理解考古学前輩们的学术研究成果之后，对很多接触到的问题产生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然后，便尝试着将这些看法用一定的学术规范论述出来。渐渐地，我发现我所触及的问题已经足以单独成篇，我便下决心把对“诸夏认同”的探索单独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范围。成文之后，导师提示全文更多部分谈夏商周三代考古学文化的起源，而结尾才谈到诸夏，于是又在标题“诸夏认同”的前面加上了“中国文明的起源”。

预答辩时，各位老师提出“中国文明的起源”题目范围太大，研究者太多，分量太重，建议隐去或者淡化“中国文明起源”这个大题目，突出诸夏的认同。然而，提交外审的期限已近，论文的题目的修改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在正式答辩之前，因为题目没有改，论文的内容也必须兼顾题目的完整性，因此主要内容也没有修改。付梓之前，我同编辑商量，是否要重新确定书名，借此把前番老师对标题的意见采纳进来。但是发现绪论和前面几章还是按照“中国文明的起源”来写的，当然它们都是“诸夏认同”的铺垫，因此，犹豫再三，最终没有完成变更书名的任务。

除了题目的问题，水涛教授、胡阿祥教授在评阅和答辩过程中还提出了诸多重要的意见，诸如，按照考古学论文的标准，文中的很多论述是需要用器形图和地层图来表述的；再如，对某些观点的论述选取的证据带有倾向性和选择性，不够全面；又如第五、六章论述周和夷文化的时候，较少或者完全脱离了考古学的叙述路径而进入了上古史的论述模式，这就使全文前后出现了叙述方式的不一致。这些问题或者涉及到考古学的基本功，或者涉及到研究面的再扩大——从新石器进入青铜器，因此，要想根本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头开始系统学习和训练考古学的知识和各种技能。

同时，各位老师又对本文提出了诸多肯定，笔者在为提交论文而填写的同

行评议书时,归纳了各位老师的积极评价如下:

丁新同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从文化和族群认同的角度来探索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国文明的起源过程与问题,选题具有很好的开创性。文章充分利用考古学、文献学、环境生态学、民族学等不同理论方法和大量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中国文明起源东西二元说为依据,先后讨论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东西文化关系、陶寺文化与夏文化起源的关系,龙山文化与商文化起源的关系、戎文化的产生、周文化的起源与夏的关系,夷人的出现等诸多重要学术问题,作者认为中国文明大体上是东西二元文化碰撞的结果,有着较为集中的文化中心和比较清晰的发展脉络。夏商周以及周边的所谓“戎狄蛮夷”的交替是不同族群在三代历史演变过程中从中心到边缘,再从边缘到中心交替反复的过程。

本文的贡献在于:其一,运用更加丰富的考古类型学资料,通过更加细密的区系异同比较,使得既往的诸多认识更加坐实;其二,叙述的语境,从既往的或考古或文献或器物或史事,进步到力求考古器物与文献史事融为一体、彼此勾连、相互证明;其三,引入了一些理论、方法或概念,如认同(包括血缘认同、文化认同、治理认同等)、文化大系、制衡关系、社会治理,由此使得传统研究课题具有了新的面貌。

因此总的来说,这是一个重大而有价值的选题,本书提出了很多有新意的观点。对于如此宏大的选题而言,可能它的完善和修改绝不是修修补补、查漏补缺的修缮,而是将每个部分拆分出来进行彻底地重构。而这绝非本人和本书所能独立完成的。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考虑不妨换一种思路,先将此文公布于众,让其接受最广泛的批评和建议,让其融入中国文明探源的宏伟进程中去,其有价值的思考将继续深入、发扬光大,其无价值的观点将存为一说。这就是作者将此不成熟的研究仓促付梓、出版成书的初衷,也是作者不忍邀请两位导师作序背书的原因。

此项研究发源于作者公派留学期间,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委给予的资助,感谢北京大学给予的国内访学资助,感谢水涛教授对本人博士后在站研究的资

助。感谢父母对我的教育培养和对本书写作与出版的支持。感谢本人的硕士、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计秋枫教授,感谢联合培养导师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历史系肯德里克·奥利弗教授(Professor Kendrick Oliver),感谢访学导师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感谢蔡佳禾教授、冯梁教授、洪邮生教授、胡阿祥教授、胡传胜教授、杨光海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我将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中不断吸收、完善,一定不辜负你们殷切的期望。

更期望广大考古学界、古史学界、民族研究等领域的前辈和同行们不吝提出批评和宝贵意见。

本文的不足和疏漏由作者本人承担,文责自负。

丁 新

2016年4月13日于杜厦图书馆

目 录

图表目录.....	1
代 序.....	1
绪论:文明的起源与认同的产生	1
第一节 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概况.....	3
第二节 文明的概念.....	9
第三节 文明的内涵和动力	16
第四节 文明起源问题的诸多探索路径	22
第五节 本书主要内容和章节构成	31
第一章 中国文明东西二元说新论	34
第一节 考古学视野下的东西二元对立:以三足器为例.....	36
第二节 绿松石、花边罐和其他一些标志性分野特征.....	44
第三节 东方文化的西进与中原龙山文化的产生	48
第四节 仰韶文化部分西迁与马家窑文化的产生	51
第五节 庙底沟二期文化族属的探寻	54
本章小结	56
第二章 夏文化的起源:陶寺文化的性质与族属补证.....	57
第一节 陶寺遗址与夏文化起源的关系	57
第二节 陶寺“庙底沟二期文化层”性质判断	64
第三节 陶寺文化早期的都邑文化特征与尧舜时期联盟古国	73
第四节 陶寺文化中期的集权性文化特征与夏文化的产生	82
第五节 陶寺文化晚期龙山特征的回归与夏商周三代文化分野	94
本章小结	99
第三章 商文化的起源与龙山文化的复兴.....	101
第一节 先商文化与龙山文化的渊源关系.....	102

第二节 商文化的地望.....	106
第三节 商代的都邑统治结构.....	108
本章小结.....	111
第四章 戎的产生:以魏营子文化为例	112
第一节 魏营子文化的独特性.....	113
第二节 魏营子文化与相关文化年代上的衔接关系.....	115
第三节 魏营子文化与相关文化的考古学联系.....	118
第四节 魏营子文化与相关文化的历史文献联系.....	124
本章小结.....	130
第五章 周文化的起源:从三里桥到碾子坡	133
第一节 从三里桥到碾子坡:周人的起源与周夏关系	133
第二节 商周关系的历史地理考证与周人的流转过程.....	148
第三节 穀的出身与文王受命的文本隐喻.....	162
第四节 太伯奔吴与文王伐崇:周人克商的历史进程	166
第五节 “归马于华山之阳”辨正.....	178
本章小结.....	180
第六章 夷的出现:周人克商之后的社会治理	182
第一节 周人克商之初的基本态势.....	182
第二节 缘起:武王之忧、周公之祝、嘉禾之命	185
第三节 治理:天室、天邑、成周	190
第四节 天命:大诰、召诰、多士	198
第五节 有礼:皇矣、酒诰、梓材	204
本章小结.....	208
结语:孔子的夷夏观与诸夏认同的起源	209
参考文献目录.....	213
Abstracts	230
索 引.....	235
后 记.....	237
致 谢.....	241

图表目录

图 1 人格心理结构分析图	17
图 2 民族认同(文明)结构图	17
图 3 北首岭老官台文化 77M10 陶器组合	37
图 4 北首岭仰韶文化早期典型陶器分布图	38
图 5 陶寺文化遗址Ⅲ区 T333、334 西壁断面图	65
图 6 陶寺早期大墓中的彩绘龙盘	78
图 7 山西临汾下靳墓地 M47 平面图	81
图 8 陶寺早期小城中期大城平面图	88
图 9 Ⅱ FJTI 平、剖面图	92
图 10 十天干方位图	110
图 11 十二地支方位图	110
图 12 马家窑文化、二里头文化、魏营子文化中的罐状附加堆纹	120
图 13 石鼓文中的“吾车既工”	151
图 14 九州结构的九宫格示意图	159
图 15 天干方位图(大禹治水路线图)	159
表 1 东下冯遗址狗骨、羊骨、红陶与绿松石对应关系	85
表 2 陶寺遗址碳十四测定一览表	93

绪 论

文明的起源与认同的产生

本书选题受益于笔者的导师计秋枫教授长期从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广义上的中外关系史包括整个中华民族与外来民族、中原民族与周边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的互动过程,而大一统理论是两千多年来指导中华民族处理内外关系最核心理论之一。计先生在2008年曾有《“大一统”:概念范围及其历史影响》一文发表于《光明日报》理论版。^①受该文的启发和影响,笔者对中国大一统理论传统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逐渐发现横亘中国古代社会两千余年的大一统思想根植于中华民族主体的民族认同中。2009年年末遂有《汉代主流意识形态变迁与汉匈关系》未刊稿产生,该文对汉民族主体认同的产生做了历史学分析,认为汉民族的主体认同来源于诸夏认同,是诸夏认同在秦汉时期得到继承与发展。那么,诸夏认同从哪里来?诸夏民族为什么会对“夏”民族和“夏文化”产生认同,从而产生“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这种诸夏民族认同呢?民族认同的重要阶段是对文化的认同,这里的文化与考古学的文化概念所覆盖的范围大致相当,基本上所有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发掘遗存的器质与器形特征、葬俗与居住址特征、文字与纹饰特征都可以成为产生集体身份认同的客体。因此对诸夏认同的探求势必深入夏商周三代文化起源、影响与传承的考古学研究领域中去,否则,诸夏认同的研究就将流于在传说故事中循环互证。简单地说,认同的产生与文明的起源是密不可分的一个硬币的两面,文明的起源必然包涵认同的产生,而集体身份认同发展到一定阶段也会推动文明的产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必须经历民族认同的产生。这是本书将对诸夏民族认同的研究延伸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原因。

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是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领域的终极命题之一,也是

^① 计秋枫:《“大一统”:概念范围及其历史影响》,《光明日报》2008年4月27日,理论版。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最初动力。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揭开了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序幕。随后伴随着民族解放与发展的复兴之路,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和探索成为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始终热点问题。随着殷墟、龙山、二里头、二里岗、良渚、陶寺等诸多大型文化遗址的发掘,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发展。中国考古学界诸位领军人物几乎都发表过重要的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论述。^① 在国家层面,1996年5月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2001年又启动了国家大型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但现有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总体上立足于考古学领域,局限于物质层面时间与空间联系的二元世界中。本文从集体身份认同思路入手,深入考古学领域,试图以认同作为界定文明的标志,以此作为探索夏商周文化起源的脉络。因为,文明的主体是民族,而民族的形成在超越血缘认同基础上,以产生文化认同和统治认同为形成的标志。因此,探索文明的起源不仅要对埋藏地下的考古学遗存做文化特征上的概括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还要上升到对文化特征产生集体身份认同。由这种认同产生的内在凝聚力,进而推动群体成为一个拥有有效身份认同的生存与发展的共同体和行为体。这就是民族。这一过程建立在考古学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之上,又不仅仅限于对考古学遗存器质和器形上的文化特征的联系,从而突破了以往考古学研究文明起源的传统路径。水涛先生20世纪初就曾经提出:“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作用主要是体现在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方面,即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观念体系层面,而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表现在文化的表层层面,即物质文化产品的基本形态上。”^② 将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从传统考古学注重文化的表层的联系深入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去,这正是本书选题和研究所尝试实践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① 具代表性的著述可参见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文集》(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1987年第12期;苏秉琦:《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5期;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田昌五:《仰韶文化社会性质与中国文明起源若干理论问题》,《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李学勤:《考古学与古代文明》,《北方文物》1986年第3期;水涛:《论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中原文物》2001年第6期;范毓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史学月刊》2008年第10期。

^② 水涛:《论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中原文物》2001年第6期,第31页。

本书的主要论点是,中国文明起源于东西二元异质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在夏商周三代的交替更迭过程中,不同族群相互融合,最终形成诸夏的民族认同。起初,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时,东方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向西传播产生了龙山文化。龙山时代晚期,在晋南豫北一带形成了较为明确的文化中心,即陶寺文化早期。大洪水使西方文化重新占据了优势,并在陶寺文化早期基础上产生了夏文化。东方文化系统再次复兴,使商取代了夏,而周人再次回到中原则又取代了商文化。中国文明是东西二元文化碰撞的结果,有着较为集中的文化中心和比较清晰的发展脉络。夏商周及周边戎狄蛮夷不同族群三代的历史演变过程,是从中心到边缘,从边缘到中心相互交替的过程。优势文化在竞争中取胜,得以占据九州之中,居中统治天下,而处于劣势的族群则暂时避居山区荒漠湖泊沼泽,待重新积聚力量以后重新对中原构成冲击。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循环往复的一个缩影。司马迁所述诸夏文明与戎狄蛮夷皆出同源,并非完全虚拟之辞。

本篇绪论的主要内容在于阐述本文的论述原理,即为什么要从诸夏认同的角度来谈中国文明的起源,怎样构建文化认同与文明起源之间的关系,以及沿着这种思路,探讨夏商周三代文明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是怎样的,过程是如何演变的。在这一阐述过程中,同时完成对前人研究综述、理论支撑、研究方法和篇章结构及其主要内容的概述。

第一节 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概况

早期的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从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到殷墟、龙山文化的发现,我们更认为是一种寻找和探索,包括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也只能看作是建立在古史文献上的一种假说。因为在那时,现今的夏商周及其以前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大多数还没有问世。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以及先前发掘的殷墟、龙山、仰韶、大汶口文化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各自历史时期的特征以后,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因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本质上是同一时代不同地区文化横向空间联系和同一地区不同文化层纵向历史联系的概括分析,是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因此,在一个文化遗址上永远探究不出它究竟是不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文明的起源研究在考古学语境下是一种文化间的关系学。这是本文的核心指

导思想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会出现所谓“文明的曙光”说和“满天星斗”说等各种不一而足的说法,因为这些说法没有足够重视不同文化区系之间彼此间的联系。

最早较为全面研究中国民族形成的研究应属 1928 年李济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次人类学的探索》。李济先生主要利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人体测量、古代典籍两个方面入手,通过对中国人种“我群”和“你群”的分类,论述了中国人种的构成、迁徙和演变。^①

中国文明起源的开创性研究当属夏鼐先生 20 世纪 80 年代发表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朱乃诚先生认为:“夏鼐的这一论断从根本上解决了通过什么样的研究途径,应用什么样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②夏鼐先生的这篇重要文献最早是 1983 年其在日本发表的一篇演讲,后来经整理在日本出版。夏鼐先生还在此文中提出了以“都市”、“文字制度”和“青铜器铸造技术”这三点作为探索中国文明的三项标志。而本文认为,都市或者说都邑、城址的出现是文化形成的重要条件。文化只有在相对封闭的城市中才有聚拢的条件,才会形成风格和特征,才会产生集体认同。而文字则是记录文化、传播文化最重要的载体,青铜器与陶器则是承载共同文化认同符号的实物载体,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人们探索文化发展脉络的最为重要的线索。夏鼐先生在这篇著作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说如果把高度发达的小屯殷墟文化“认为这是中国文明的诞生,那就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③,这就为夏文化的存在提供了理论上的空间。

苏秉琦先生 1985 年做了《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讲演,旨在“通过探索辽西地区文明的起源、发展过程和方式,来推动中国考古界对文明起源问题的思考”。^④苏先生的这次演讲随即引起了“中国文明起源热”。苏先生对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论述中最重要的观点是对路径和模式的三个三部曲概括:“从氏族公社向国家转变的典型道路——古文化、古城、古国;国家发展的

^① 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

^② 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篇划时代文献——读〈中国文明的起源〉》,《南方文物》2007 年第 4 期,第 12 页。

^③ 夏鼐:《夏鼐文集》(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402 页。

^④ 苏秉琦、邵望平:《百万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苏秉琦谈考古学的中国梦》,选自邵望平著:《邵望平史学、考古学文选》,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509 页。

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国家形成的三模式——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①苏先生的这一观点较好地概括出了文明发展的路径，但在笔者看来，问题在于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分界点并不是十分清晰。苏先生近年还有《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出版，丰富和发展了先前的观点。

张光直先生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也有丰富的论著，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先后发表过三篇论文。2004年《文物》第1期发表了他的遗作《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张先生首先全面地论述了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西方输入说”与“东方摇篮说”的学术论战过程。随即从文明的定义入手来探讨如何寻找中国文明的根源。他提出了两条途径，“第一条是先决定文明这个概念之下包括什么具体的成分，然后再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找寻这些成分在哪一个段落中出现”。^②这种方法借用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理论，然后概括出一些标志，例如邹衡先生的“文字、铸造和使用青铜器、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这种途径的问题是，人们很难概括出符合每一种文明诞生过程的要素或者标志，不同的文明其内容和特征显然是不同的。张先生给出的第二种途径是“先将中国古代文化社会史作一番客观的分析，看看应该分成哪些阶段，再看看到哪一个阶段我们可以谈到‘文明’的出现”。^③其实这种途径也是有问题的，为什么“部落、酋邦、国家”中的第二个阶段“酋邦”可以算作文明阶段呢？张先生也没有给出十分充分的解释，并且表示需要进一步的分析探讨。在笔者看来，也许正是因为“酋邦”这种组织已经超越了血缘认同，而产生了文化认同，因此，我们大多数人会认可“酋邦”将作为文明起源的第二个阶段。

张先生在正文第二部分引用了金观涛、刘青峰两位先生提出的用系统论和控制论来解释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观点，认为中国境内好几个新石器文化虽然独立发展，但“在地理空间中扩张而彼此发生接触，产生交流互动关系。由于这第二项现象，中国范围内所包括的许多地区文化彼此之间构成一个大的文化系统，而各个个别文化都不能把它孤立看待。换言之，中原文化虽然目前在年代上有优先地位，它的发展并不是孤岛式的，而必须作为较大的文化系

^① 苏秉琦、邵望平：《百万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苏秉琦谈考古学的中国梦》，选自邵望平著：《邵望平史学、考古学文选》，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09页。

^② 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2004年第1期，第75页。

^③ 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2004年第1期，第76页。

统的一部分来加以分析和讨论”。^① 据此,张先生提出用“文化相互作用圈”的概念来分析圈内几个区域性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认为“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所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② 张先生引述的这句话正是本书从探讨秦汉民族认同一路追寻到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原因所在。张光直先生所提倡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基础”^③的思想方法也是本书力图运用的分析思路。

对于张先生在最后一部分探讨中国文明的动力从考古学上讲是“政治与财富的结合”,笔者认为,表述为“生存与发展”更为恰当,因为这是任何一种文明存在的物质基础。在大洪水以后,中原成为农业社会的核心区域,以及对中国获得控制力所带来的统治权的权威性,是各种区域文化纵横捭阖逐鹿中原的动力所在。

同时代的另一位大家邹衡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诞生》一文中着重从“文字”、“城址”和“青铜器铸造”三个维度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他认为“二里头文化中成组宫殿群建筑的出现和都城的形成,青铜器中礼乐兵器的产生文字的发明等等,这些又都是商周文明所共有的,龙山文化中没有这些因素”。^④ 因此可以认为二里头文化是中国文明最早的起源。除了这篇概述之外,邹衡先生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版)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夏商周三代考古学研究,以及彼此之间的传承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包括与周边文化之间的关系。本文正文部分也多次引用了邹衡先生的研究成果。

除了上述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外,还有一些有影响力的观点。严文明先生认为“中国史前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大致发生在铜石并用时代,并且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约当仰韶文化后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3500年至前2600年,第二阶段约当龙山时代,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年至前2000年,……铜石并用时代大致相当于史书记载的五帝时代”。^⑤ 安志敏先生的《谈谈中国文明的起源》主要针对“文明的曙光”和“满天星斗”论做了

^① 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2004年第1期,第78页。

^② K. C.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4th edition 1986), p. 242.

^③ 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自序”,第10页。

^④ 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1987年第12期,第73页。

^⑤ 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第48、49页。